

扎根理论在国内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误区与纠偏

陈辉映, 蒋佩佩

(扬州大学 体育学院,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 扎根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但其科学性和规范性仍存在诸多争议。研究系统梳理国内体育学领域应用扎根理论的相关文献, 探讨扎根理论在当前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误区及提出纠偏建议。研究发现, 扎根理论在体育学的应用中存在差异关系认识不足、抽样方法选择随意、编码程序方法误用以及研究目的追求偏差4个误区的问题。研究从扎根理论并非迭代发展、扎根理论是独立的方法论、扎根理论的研究问题是研究对象关心的问题、扎根理论的抽样方法是理论抽样、扎根理论文献回顾后置、扎根理论不是三级编码、扎根理论不需要信效度检验以及扎根理论的目标是生成理论8个方面进行纠偏, 旨在提升研究者在应用扎根理论时的判断力和严谨性, 进而推动体育学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关 键 词: 体育学; 扎根理论; 三级编码; 编码程序; 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3-0039-10

Misconceptions and correc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in domestic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CHEN Huiying, JIANG Peipe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in sports researc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idespread,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its scientificity and normativity. The present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levant literature in domestic sports science which applies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also explor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misconceptions in its application while proposing corrective suggesti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re are four main misconception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through sports science such a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ants, arbitrary selection of sampling methods, misuse of coding procedures, and deviation from research objective. This study proposes certain corrections from eight aspects including the grounded theory is not iterative development, the grounded theory is independent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e grounded theory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e research participants, the sampling method of the grounded theory is theoretical sampling, literature review in the grounded theory should be postponed, the grounded theory is not three-level coding, the grounded theory does not requ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ing, and the goal of the grounded theory is to generate theory.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improve researchers' judgment and rigor when applying the grounded theory, thereby promot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ports science theory.

Keywords: sports science; grounded theory; three-level coding; coding procedure; qualitative research

扎根理论产生于1965年, Barney G Glaser 和 Anselm L Strauss 两位美国学者在《死亡意识》一书中应用扎根理论对临终病人关怀进行研究, 引起了学界

的广泛关注^[1]。1967年, Glaser 和 Strauss 合著《发现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的策略》一书对扎根理论进行系统阐述, 提出研究要关注理论的生成过程, 而非对理

收稿日期: 2024-11-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24YJC890004)。

作者简介: 陈辉映(1987-), 女,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体育教师教育、学校体育学、终身教育。E-mail: xixi87729@163.com

论的验证^{[2]hiii}。“从数据中发现理论”被 Glaser 和 Strauss 称为扎根理论,其要义在于通过持续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系统获取的数据中发现理论^{[2]i}。

扎根理论^①与学界普遍运用的由 Anselm L Strauss 和 Juliet Corbin 发展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及由 Kathy Charmaz 发展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存在本质差异。尽管当前学界将三者统称为扎根理论的不同流派^[3]或版本^[4],但严格而言,这种称谓有可商榷之处。流派中的“流”有流布、流传之意,因而“流派”就暗含“根”“源”“脉络”之意^[5]。版本指一部图书经由抄写、刊刻等方式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实物形态^[6]。“流派”或“版本”的划分应当基于同一理论基础的衍生发展且延续原方法论的核心要义。若方法论的核心要义发生根本的变化,则不宜被称为不同的“流派”或“版本”。扎根理论的研究视角在于没有任何的预设,关注研究对象所关心的问题,研究自然呈现的行为模式^[1]。这一核心要义强调研究者保持理论敏感性,避免预设理论框架,以确保模式与概念关系自然浮现。然而, Strauss 与 Corbin 在其发展的“程序化扎根理论”中不仅提出研究问题来源与质性研究相同,可以来自文献与专业经验等^{[7]33-35},还引入预设的“典范模型”^{[7]99},将比较分析程序结构化为一组固定要素;而 Charmaz^{[8]10}则强调主体间的互动与意义阐释,不认为理论与数据是被发现,突出研究者立场及其对研究过程的影响。这些改变虽然在形式上拓展了研究工具的应用维度,却在本质上改变了扎根理论的理论生成逻辑。当这些经过实质性改造的方法仍冠以“扎根理论”之名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方法论核心概念的边界模糊。本研究梳理扎根理论在体育学的应用误区时,沿用样本文献的术语表述,以客观呈现学界的研究现状,避免因术语转换造成的阐释偏差。在纠偏部分,为明确方法论边界并确保概念准确性,本研究将统一采用“Strauss 方法”指代“程序化扎根理论”,以“Charmaz 方法”指代“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自引入我国体育学界以来,虽得到广泛应用并产出了丰富成果,但其应用过程中存在“误用错用”现象,且这一问题日益凸显。近年来,学界开始对扎根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反思性研究,包括综述扎根理论的运用情况^[3],反思扎根理论研究迭代过程^[9]、探索扎根理论研究质量评价与控制^[10]以及分析扎根理论的适配议题和理论基础^[11]等,这些研究对促进扎根理论的规范应用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其局限性在于主要基于国内传播最广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展开。本研究以“扎根理论”为篇关摘对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截至 2024 年 6 月 18 日,来源

类别选择北大核心,学科选择体育学,共检索相关索引文献 130 条,剔除超过 10 年的文献以及非体育领域文献共计 15 条,剩余 115 条,通过审查论文题目、摘要和全文阅读的方式进行筛选,剔除与主题不符的文献共 26 篇,最终确定 89 条文献作为数据来源进行系统分析。石岩等^[10]指出体育领域扎根理论基础薄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经典原著的深刻且系统学习。本研究系统研读原著,基于对扎根理论的深入梳理,分析国内学者在体育学研究中应用扎根理论的误区并提出纠偏建议,以期规范扎根理论在体育学领域的应用提供参考。

1 扎根理论在国内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误区

1.1 差异关系认识不足

国内体育学研究对扎根理论存在认知差异,且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阐释方面存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对 89 篇文献的分析发现,有 3 篇明确说明使用经典扎根理论,3 篇明确说明使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77 篇涉及程序化扎根理论,但其中只有 25 篇说明使用该方法。研究普遍存在用“扎根理论”指代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现象,还有研究的理论依据是 Glaser 的扎根理论,研究过程采用的却是程序化扎根理论^[12]。扎根理论差异认识不足体现在方法定位、文献使用时机和理论视角运用三个方面。首先,在方法定位上,有 52 篇将扎根理论界定为质性研究方法,还包括 2 篇应用经典扎根理论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将扎根理论等同于质性研究,其研究问题的提出方式未能遵循扎根理论所强调的“研究问题自然涌现”原则。如有研究使用经典扎根理论对体育智库竞争力建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13],但研究问题由研究者预先拟定,这与扎根理论主张的“研究问题在持续解决它的过程中被发现”相悖。其次,在文献使用时机方面,25 篇在开篇设置文献综述部分,表明研究者有意进行文献梳理,但后期却未能将生成的理论与已有研究充分对话。Glaser^{[14]32}认为扎根理论应避免文献和假设的干扰,以真正地实现数据驱动研究。最后,在理论视角运用上,有 23 篇在初始阶段就明确了研究的理论基础。例如,有研究以协同理论为基础,运用经典扎根理论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15]。另有研究将扎根理论与学校体育资源配置研究并列作为该研究的理论基础^[16]。仅将扎根理论作为补充已有理论框架的数据分析工具,这违背了扎根理论强调理论生成的方法论原则。

1.2 抽样方法选择随意

理论抽样和理论饱和是扎根理论的核心概念。理论抽样是为生成理论而进行的动态数据收集过程,研

研究者通过同时进行数据收集、编码和分析,逐步推动理论的生成^[245],贯穿整个研究直至理论饱和^[261]。

扎根理论采用理论抽样。在89篇论文中,仅12篇明确使用理论抽样。主要存在以下误区:其一,29篇混淆理论抽样与其他抽样方法,特别是误将目的性抽样等同于理论抽样。如有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获取半结构化访谈资料^[17],或通过非随机抽样中的立意抽样^[18]和滚雪球抽样^[19]确定访谈对象。这些基于样本属性的抽样方法偏离了理论抽样促进概念或理论产生联系的本质。其二,38篇抽样方法不明确。例如,有研究一次性抓取微博评论文本^[20]或网络平台的游记、攻略和访谈录^[21],难以真正地实现理论抽样的动态过程。其三,10篇不当地将理论抽样与其他抽样方法结合使用。例如,有研究在方法设计中采用理论抽样的方法选取访谈对象,而在资料收集中又采取随机抽样选取调研地区^[22]。这种抽样方法无法实现数据收集服务于理论生成的目标。在明确采用理论抽样的文献中,对如何开展抽样,又如何结合抽样进行理论构建也存在语焉不详的问题。抽样方法的误用直接影响了理论饱和的有效检验。理论饱和的误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部分研究用信效度指标验证研究的理论饱和度。例如,有研究采用Cronbach α 系数检验核心范畴的内部一致性水平并使用KMO等数值来检验理论饱和度^[23]。第二,部分研究以“没有新的资料出现^[24]”“无新概念节点^[25]”“与其他类属建立系统联系^[26]”等表述来认定理论饱和,这样的理解未能全面反映理论饱和的实质。

1.3 编码程序方法误用

编码程序方法误用主要体现在将扎根理论等同于三级编码、信效度检验不当以及备忘录使用欠缺三个方面。首先,在89篇文献中,有45篇将扎根理论等同于三级编码。具体的误用体现在:第一,过度依赖Nvivo等软件对文本资料进行三级归纳。如有研究借助Nvivo软件对研究资料进行三级编码,生成434个自由节点、33个子节点和7个核心类属^[27]。这种编码方法就是典型的仅对文本资料进行三级归纳式的内容分析。第二,将Glaser的6C概念与Strauss的典范模型混用^[28],或误将经典扎根理论与程序化扎根理论结合使用^[29]。其次,在89篇文献中,30篇进行了信效度检验,主要采用编码一致性和重测法等方法。有研究通过独立小组进行背对背编码,要求85%以上的编码结果达成一致^[30]。另有研究通过异地同步编码计算信效度^[31],或采用重测法检验三级编码结果^[32]。然而,这些检验方法存在局限:由于编码者多来自同一学术共同体,其较高的编码一致性可能营造出科学主义的假

象^[33],且与扎根理论对可信度的阐释存在偏差。最后,89篇论文中72篇未提及备忘录的使用。少数使用备忘录的研究主要将其作为生成理论模型的依据^[34],或强调其在类属提炼整合中的重要作用^[35]。整体来看,研究对如何使用备忘录以及备忘录如何促进理论的生成上阐释不够。

1.4 研究目的追求偏差

对89篇体育学扎根理论研究的分析发现,根据研究目的可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42篇)以概念的维度或特征属性为研究目的,构建概念模型。如“民俗性”概念特征模型^[36]、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手段模型图^[37]、体能教练实践能力模型^[38]以及冰雪体育用品共性技术应用过程绩效评价指标体系^[39]等。第二类(40篇)以概念的过程属性为研究目的,构建理论模型。如马拉松参赛旅游体验质量的形成机制模型^[40]、体育志愿服务持续参与行为影响机制^[41]以及滑雪消费心流体验机制^[42]等。第三类(7篇)主要以体现概念的关系属性为研究目的,构建理论模型。如骑行旅游与体验生成关系的动态依附模型^[21]、马拉松参赛者阈限体验关系模型^[43]以及老年人数字体育融入障碍的因果关系理论模型^[44]。以生成概念维度和特征属性为目标的研究本质上属于描述性研究,与扎根理论的理论追求存在一定差距。其一,仅停留在“概念特征”“影响因素”等描述性层面的研究,需审慎评估其是否契合扎根理论的研究旨趣与方法论。其二,若研究仅归纳出“个人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管理因素”或“宏观因素”“环境因素”“人际因素”“心理因素”等松散类属且缺乏紧密关联的研究,难以体现体育学研究者的理论敏感性,也无法展示通过不断比较分析所揭示的类属间的张力关系,从而削弱扎根理论在概念创新、揭示复杂关系及探索新领域等方面的价值。

2 扎根理论在国内体育学研究中应用误区的纠偏

2.1 扎根理论并非迭代发展

扎根理论、Strauss方法和Charmaz方法是出现时间先后的关系,并不存在迭代发展的关系,其差异不仅体现在研究程序上,更体现在理论基础的独特性上。国内学者普遍将扎根理论视为实证主义范式^[45]。然而Glaser明确反对将其简单归类为实证主义或解释主义,认为扎根理论在方法论上保持中立^[46]。尽管Corbin等声称Strauss在后续研究中仅对数据处理方式进行了创新性调整,其方法论本质仍植根于与Glaser共同构建的理论框架,既未偏离原始方法论也未形成新的研究分支^[47]^[31]。然而,Strauss方法明确将实用主义和符

号互动论作为其理论基础^[48]，这一方法取向使其在认识论层面与扎根理论形成了本质差异。Charmaz 方法论推崇的是经验世界的一手知识，在后现代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取中间立场^[49]。该理论基于多重性、过程性和建构性的现实观，认为数据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建构的产物^[50]。对此，Glaser 批评其是一种“误称” (misnomer)，认为其过分关注参与者经验的精确描述，以解释性阐释作为结论，偏离了扎根理论追求概念化结论的本质^[51]。

作为扎根理论的共同创始人，Strauss 在其 1990 年出版的《质性研究基础：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与技术》专著中明确将该书定位为“扎根理论”系列丛书的第四册^②。Strauss 在书中试图调和其与 Glaser 的方法论分歧，声称尽管 Glaser 于 1978 年出版的《理论敏感性：扎根理论方法论新探》与其于 1987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家的质性分析方法》在术语选用和操作程序上存在差异，但二者在质性分析的理论立场和基本步骤上保持高度一致，Strauss 甚至强调，这部著作对质性分析的程序与技术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78]。然而，这种表述事实上模糊了二者在方法论本质上的重大分歧。值得警惕的是，Strauss 在后续研究中逐渐背离了扎根理论的核心原则，却仍将其新方法冠以“扎根理论系列丛书^[78]”之名。这种命名策略不仅导致学界普遍误将 Strauss 和 Corbin 的方法视为扎根理论的迭代发展，更使后续研究者误将 Strauss 方法等同于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强调研究问题与理论生成的自然涌现。基于该立场，这要求体育学研究者在开展研究前必须明确自身需求，审慎选择并深入理解扎根理论。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严格遵循扎根理论方法论要求，确保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真正源自并回应研究对象的实际关注。只有当研究者既有清晰的理论立场，又严格遵循上述程序，并让概念植根于研究对象的经验世界时，才能涌现出兼具学术解释力和实践指导价值的体育学理论。

2.2 扎根理论是独立的方法论

关于“扎根理论是否是质性研究方法”的学术争议，现有研究的理解存在偏误。这一误解主要源于学界对扎根理论发展脉络缺乏系统审视。Glaser 与 Strauss 在开创性著作《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策略》中提出扎根理论，明确将其界定为既可应用于质性研究，也可支持量化研究的方法论框架。然而，随着 Strauss 和 Corbin 提出程序化操作范式以及 Charmaz 发展建构主义取向，这一方法论被逐步限定于质性研究的专属工具。Glaser 等^[26]强调扎根理论的重要尝试在于系统整合质性与量化研究，探索理论生成的最佳路

径。扎根理论秉持“一切皆数据”的理念^[52]，适用于从系统收集的数据（无论是质性还是量化数据）中发现理论^[53]。为证实扎根理论在定量研究中的适用性，Glaser 于 2008 年出版《做定量扎根研究》，强调定量扎根理论作为一种量化数据分析路径，同样可以补充、超越并修正现有理论^[54]。然而，Strauss 在其后续研究中将扎根理论界定为质性数据分析方法，尽管其原著中提及书中大量引用 Glaser 的《理论敏感性》一书^[55]，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Glaser 提出扎根理论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存在，区别于其他冠以“扎根理论”之名的各类质性数据分析方法^[56]。Glaser 批评 Strauss 是在借用扎根理论进行强迫、完整、概念性的描述^[14]，而 Charmaz 是借用扎根理论名义进行描述性质性数据分析^[51]，而过度关注细节会降低理论的抽象程度^[52]。Glaser 和 Strauss 在 1967 年出版的《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策略》一书中，通过副标题提示扎根理论可作为质性研究的有效策略，而非等同于质性研究方法。Glaser 指出，当时的质性研究存在要么理论性不足，要么理论过于“印象派”的问题^[21]，即缺乏严谨性和系统性。扎根理论的提出弥补了质性研究实证精神的不足^[33]。其核心是通过深入比较分析生成抽象概念与理论，这一过程不受数据类型限制。因此，扎根理论应被视为一种超越传统质性研究范式的独立方法论，其本质特征是通过系统分析数据生成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而非局限于现象描述。这种理论生成导向使其与传统质性数据分析方法形成本质区别，体现了更广泛的方法论价值。

鉴于当前学界对扎根理论方法定位的误用，建议体育学研究者采取以下研究策略：其一，应超越将扎根理论简单归类为质性研究方法的传统认知，充分认识其独特的理论生成价值，明确 Strauss 方法与 Charmaz 方法不等同于扎根理论。其二应审慎评估研究方法的选择，如果研究目标仅限于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归纳与分析，建议采用其他更为适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不必非要应用扎根理论。

2.3 扎根理论的研究问题是研究对象关心的问题

扎根理论究竟研究谁的问题？扎根理论主张研究者应该“头脑空白”地进入现场，避免将预设的理论投射到经验世界^[57]。Glaser^[53]主张研究者以完全开放的心态进入研究领域。随着编码、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的推进，待核心类属开始浮现并趋近于饱和时，研究问题便会快速呈现出清晰的结构，研究问题的发现过程与其解决过程本质上是统一的，解决问题的过程往往反向界定了问题本身^[14]。Glaser 特别指出，研究者应抵制预设问题的冲动，保持“未知”心态，直到

研究问题自然浮现^{[14]24}。Strauss方法则认为研究问题来源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无异^{[7]33},初始问题较为宽泛,但随着概念关系的发现逐步聚焦^{[7]37-38}。Glaser批评Strauss方法基于实质性问题强制生成的研究结果背离了扎根理论的本质,是概念描述的强制关联^{[14]4}。Charmaz方法强调深度质性访谈,建议设计广泛且开放的问题,通过访谈聚焦和深入讨论推进研究^{[8]26-28}。

通过对扎根理论、Strauss方法与Charmaz方法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扎根理论强调研究问题应源于研究对象的实质关切,随着核心类属的自然涌现而逐步明晰;而Strauss方法与Charmaz方法则允许研究者基于文献或个人经验提出初始研究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聚焦。基于此,建议体育学研究者进行必要的自我评估:审视自身的方法论素养和理论认知水平,评估对研究过程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并考量是否具备等待理论自然涌现的研究耐心。这种多维反思有助于研究者在复杂研究情境中保持方法论理性与理论敏感性的张力,确保研究过程既符合方法规范又具有理论创新性。

2.4 扎根理论的抽样方法是理论抽样

尽管当前体育学界的扎根理论研究采用多种抽样方法,但扎根理论只采用理论抽样。从广义上看,理论抽样确实具有目的性特征,任何经过深思熟虑的抽样都可被视为目的性抽样^[58]。但具体到方法论层面,目的性抽样特指根据研究目标选择能够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59],与理论抽样存在本质区别。理论抽样是由理论生成需求驱动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通过数据收集、编码与分析的同步互动,不断调整后续数据的收集方向与来源^{[53]36}。

Glaser^{[53]44}提出扎根理论理论抽样前的初始决策(initial decision)是基于一个广泛的问题领域,并非依赖于预设的概念和假设框架。理论抽样是非线性的,研究者需在数据与概念间不断切换,从少量观察逐步转向针对性观察。Glaser^{[53]37}强调,理论抽样不同于基于预设维度(如时间、空间、身份等)的选择性抽样,其发现过程具有持续性和不确定性,研究者在达到理论饱和前无法预知抽样内容和方向。因此,研究者在研究初期无法确定样本总量,只能在研究结束时进行最终统计。判断何时停止抽样的标准是类属的理论饱和,即当无法通过新数据进一步发展该类属的属性时,达到饱和状态^{[2]61}。Strauss方法的抽样方法涉及初始抽样决策(initial sampling decisions),但这仅是对研究场所、资料类型和群体等的初步推断^{[7]179},其抽样方法在不同版本中存在差异:前两版区分与开放编码相关的开放抽样(open sampling)、与主轴编码相关的关系和变异抽

样(relational and variational sampling)和与选择性编码相关的鉴别抽样(discriminate sampling)^{[7]176},而从第三版开始则不再区分抽样类型,强调以概念驱动,关注“概念”而非“人”^{[60]157}。理论抽样的关键在于资料收集和分析同向同行,研究者需灵活寻找能展示概念不同属性和变异性的抽样情境,直至理论饱和。Charmaz方法的抽样方法包括初始抽样和理论抽样。初始抽样是研究的起点,理论抽样则用于完善新兴类属并指引研究方向^{[8]100}。Charmaz^{[8]100-101}强调理论抽样的目的是精炼新兴理论中的类属,而非代表特定人群或增强统计适用性。此外,备忘录的撰写能推动理论抽样的过程,帮助研究者追踪线索、验证直觉并精炼想法^[61]。

综上,扎根理论坚持的抽样方法是理论抽样。“初始决策”更像是扎根理论抽样的“敲门砖”,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抽样方法。在将扎根理论应用于体育学研究时,详细描述初始决策以及理论抽样与资料分析的互动过程至关重要。即使在期刊论文篇幅限制下,对理论抽样关键步骤的阐述说明不可或缺,这既是确保研究严谨性的基本要求,也是提升理论生成可信度的重要保障。

2.5 扎根理论文献回顾后置

Glaser等^{[2]37}提出扎根理论研究者应在初期避免接触相关领域的文献,保持开放态度进入研究现场并迅速启动研究。这一策略并非否定前期学术成果的价值,而是扎根理论赋权的一部分,旨在防止现有概念框架干扰数据收集,确保理论的发现而非验证^{[53]31}。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遵循特定的路径:通过持续的比较分析,同步推进理论分析与生成,当理论在核心变量及涌现的类属属性整合中达到充分扎根时,研究者可以着手回顾相关领域的文献,并通过多种方式将文献与自身研究成果建立理论对话^{[14]32}。Glaser^{[57]123}指出,暂时搁置已有知识有助于让数据“说话”,并通过概念化比较分析客观检验概念和模式。由于在理论成熟前难以准确界定其概念领域,因此只有在理论充分扎根后,才能精准地将生成的理论与现有学术成果进行对话^{[53]31}。Strauss方法认为研究者进入研究现场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文献背景,建议承认并合理利用这些基础知识,但无需进行全面文献梳理^{[7]50}。Corbin等^{[47]88}认为可通过文献查阅制定初步的观察和访谈框架。与Strauss方法相对灵活的文献处理理念不同,Charmaz方法强调文献梳理重要性,认为文献讨论应贯穿研究全过程^{[8]167}。

扎根理论严格遵循“理论自然涌现”原则,主张通过系统编码从数据中发现理论,将文献回顾后置。相比之下,Strauss方法和Charmaz方法更重视研究者主体性,主张批判性地整合运用文献。在体育学领域

应用扎根理论时,研究者需要注意:第一,坚持数据优先原则,确保理论生成基于对原始数据的系统分析。第二,文献使用应当服务于扎根理论核心理念,文献回顾后置,避免为迎合已有理论而强行建立关联。

2.6 扎根理论不是三级编码

扎根理论的编码类型包括实质编码(substantive codes)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 codes)^{[53]55}。这两种编码是类型划分而非步骤划分,通常同步进行并在备忘录中完整呈现,在从数据中发现编码时,研究者可以相对更多地关注实质编码,而在理论分类和整合备忘录时,则会更关注理论编码^{[53]56}。实质编码负责对研究领域的经验实质进行概念化,包含开放编码和选择编码两个维度。开放编码是研究初期对数据进行广泛编码以识别各类潜在类属。当某一类属与多个其他类属及其属性呈现显著关联时,即被确定为核心类属,潜在理论模式随之显现^{[57]26}。选择编码意味着停止开放编码,研究者将编码范围限定在与核心类属具有显著关联的类属上,用于构建理论框架^{[53]61}。实质编码通过理论编码得以系统组织^[62],理论编码将实质编码间的关系概念化为假设,并将其整合到理论中^{[53]55}。

实质编码与理论编码在扎根理论中具有互补性:缺乏实质编码,理论编码将沦为空洞的抽象;缺少理论编码,实质编码则只能停留在描述性关系层面,难以形成理论深度,二者的互动是扎根理论方法论的核心所在。理论编码的隐匿性是扎根理论的刻意设计,研究者在分析实质性内容时,会从理论层面思考编码之间的关系。理论编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同一组数据可能适用于多个编码,尽管研究者的选择可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其决策仍然植根于众多具有实际价值的选项之一^{[53]72}。理论编码的广泛可能性为研究者提供了强大的理论生成路径,使其能够敏锐地捕捉数据中潜在的整合可能性^{[53]73}。Glaser 强调,扎根理论仅对类属和属性进行编码,让理论编码自然涌现,反对典范模型的使用,他认为这种编码方法违背了理论自然呈现的基本原则,固定模型的使用虽然使研究者看似系统化地处理数据,但实际上强制性地要求对数据进行全面概念描述,而忽视了这些关联是否真正解释了参与者处理其主要关切的方式^{[14]63}。这种批判反映了扎根理论对理论“自然涌现”的坚持。

Strauss 方法的编码类型包括开放编码(open coding)、主轴编码(axial coding)和选择编码(selective coding)^{[7]58}。开放编码的重点在于类属及其属性和维度的识别与发展^{[7]69},而非量化统计节点或类属的数量。属性和维度的识别为类属与子类属之间以及后续阶段中主要类属间的关系奠定基础,能够增强所构建理论

的解释力度^{[7]69-70}。主轴编码采用“典范模型”(原因、现象、情境、条件、策略和结果)将子类属与类属相关联,进行典范模型分析^{[7]99}。类属代表受访者认为重要的现象、议题或事件,而子类属则通过回答何时、何地、为何、谁、如何及有何后果等问题,赋予概念更强的解释能力^[63]。主轴编码通过关系识别丰富类属,必要时还需补充开放编码。研究者选择一个类属作为焦点,基于典范模型寻找其子类属,这些子类属可能来自开放编码得出类属、属性或新的理论抽样数据。这种非线性的编码过程使 Strauss 方法能够在开放比较中持续丰富类属及其关系,最终实现理论饱和并生成新理论。此外, Strauss 方法的主轴编码并不限于对一个类属进行典范模型分析, Strauss 等举例主轴编码可能会形成 5~6 个通过典范模型充分发展子类属的主要类属^{[7]110},且在选择编码中依然需要运用典范模型持续发展核心类属^{[7]124}。然而,当前体育学领域在运用 Strauss 方法时,往往“一次性”地使用典范模型,即先用开放编码得出主要类属,再套用典范模型进行关联,这种做法违背了 Strauss 方法持续比较的编码原则。选择编码是将所有类属整合到一个核心类属周围的过程,并通过描述性细节完善需要进一步解释的类属^[48]。其中,“故事线”和“故事”是两个关键概念:故事线是抽象后的核心类属,而故事则通过叙述揭示核心类属的属性和维度^{[7]116}。Strauss 等^{[7]58-59}提出“不同类型的编码并非严格按阶段进行(the different types do not necessarily take place in stages)”,研究者可能会迅速且无意识地在不同编码类型间切换,特别是在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之间,这两种编码类型最终都服务于选择编码。在选择编码阶段,核心类属不仅需要通过典范模型深化与其他类属的关系,还要持续丰富自身的属性和维度,直至实现类属内和类属间的理论饱和。因此,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是交错进行的动态过程,而非单向线性步骤。

2008 年,Corbin 对《质性研究的基础》一书进行重大修订,弱化了编码类型的区别,删减大量关于典范模型的内容,转而强调灵活多样的备忘录的使用。备忘录写作被视为激发思考、促进研究者创新性解读数据和编码的重要工具。Corbin^{[47]266}等指出,缺少备忘录是理论构建失败的主要原因。若研究者仅停留在概念或编码层面,而未能系统记录思考过程,将难以形成完整理论。理论构建是一个将原始数据转化为思想、定义概念、建立概念间关系并整合为整体的过程,每一步都需要通过备忘录进行详细记录和反思。

Charmaz^[64]指出, Strauss 方法试图通过标准化程序确保研究规范性,但过于严格的编码程序可能会抑制

类属的自然涌现,甚至扼杀研究者的创造力。Charmaz方法采用初始编码(initial coding)和聚焦编码(focused coding)两种编码类型。初始编码阶段要求研究者细致分析数据片段,聚焦编码则使用最重要或最频繁出现的初始编码对大量数据进行分类整合,以确定最具显著意义的类属^{[8]46}。Charmaz方法认为现实资料并非客观唯一,而是通过互动被赋予意义,进而产生过程、结构、文化与意义的理解。这种认识论立场赋予编码程序高度灵活性,同时也体现了Charmaz的核心观点:否定经验判据的唯一性、承认被访者意义的多重结构性以及反对理论一元论的现象学立场^[4]。

综上,目前国内学界常见的“三级编码”的概念是对Strauss方法的总结,这一编码程序与扎根理论存在本质差异。将扎根理论简单等同于“三级编码”的做法,不仅违背了扎根理论“理论自然涌现”的方法论精髓,更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扎根理论方法论的认知混乱。因此,研究者在体育学研究中应用扎根理论时要明晰其边界,严格遵循其方法论的术语规范与程序要求。

2.7 扎根理论不需要信效度检验

扎根理论强调研究的“可信度”,源于研究者对数据的深入理解和系统的理论生成过程。扎根理论不仅能够生成新理论,还通过持续的数据比较和分析来提升理论的可信度。Glaser等将可信度划分为研究者可信度和读者可信度^{[2]224}。前者要求研究者保持敏感,确保理论生成与数据分析紧密结合^{[2]224},后者关注研究结果能否引发读者的共鸣,以及结论推导方式的可评估性^{[2]230}。为此,研究者需生动展示数据,清晰描述研究过程,以增强理论的可信度。

Glaser等^{[2]227-228}提出部分研究者因缺乏信心过度依赖问卷调查等“客观”方法,但这些方法仅提供心理安慰,无法真正提升研究可信度。Glaser^{[14]15}提出评估扎根理论的四个标准:适切性(fit)、有效性(work)、相关性(relevance)和可修正性(modifiability),其中适切性要求理论与研究对象实际状况高度契合,有效性强调理论能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差异,相关性指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可修正性则表明理论可通过整合新概念进行修正,满足这些标准即可为行动提供概念指导。Corbin等认为可信度意味着研究结果值得信赖,能够反映多方经验,但强调这只是众多“合理”解释之一^{[60]302}。她指出,只要研究结果被视为“可信”,能够提供洞见和理解,并促进变化,那么对“真理”“信度”和“效度”的讨论就显得多余^{[60]301}。Charmaz提出的评价标准被Corbin评价为最全面^{[60]299},其中包括可信度的标准:(1)对背景或者主题的充分了解;(2)数据足以支持研究

结果;(3)系统比较观察结果和类属;(4)类属包含广泛经验观察;(5)数据与论点分析存在强逻辑关系;(6)提供充足的证据供读者独立评估并认可研究论点^{[8]182}。

扎根理论未使用传统意义上的信效度概念,也不执着于使用特定方法来追求研究的可信度。对于体育学研究者而言,关键在于详细呈现研究过程,特别是在理论抽样过程中展示理论敏感性。通过清晰的阐释与深入的反思,研究者能够将严谨性融入整个研究过程,实现研究结果的可信性,使其既令研究者信服又获得读者认可。

2.8 扎根理论的目标是生成理论

扎根理论的根本目标是生成理论,其关键在于通过系统收集和分析数据,发现实质和形式理论^{[2]32},而非局限于深描或叙述故事^{[2]30-31}。扎根理论明确指向“发现”与“生成”,研究者应避免将预设理论或假设强加于数据,而应该通过系统地比较分析从数据中“发现”理论。这种理论并非对材料的简单描述,而是对数据背后潜在模式的抽象呈现。Strauss方法(特别是后期)和Charmaz方法更倾向于理论的“构建”。尽管在术语使用上可能存在重叠(如扎根理论中也包含“build”等词汇),但在理论获取理念上存在本质差异。Corbin等^{[47]57}提出她赞同构建主义观点,概念和理论是基于研究参与者的经验构建的,并将分析过程视为研究者与数据之间的互动。这一观点表明,Strauss方法已从扎根理论的“发现”路径转向“构建”路径。Glaser^{[14]5}提出Strauss方法总能生成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并非完全源自研究对象的自然视角。Charmaz方法则更为明确地提出理论是在数据中建构的观点^{[8]2}。Charmaz^{[8]10}认为数据和理论都不是被发现的,研究者与数据都是研究世界的一部分,理论通过人与观点的互动以及过去与当前实践的结合而构建。从Glaser的视角来看,“构建”与“发现”的最大区别在于理论并非自然涌现,而是需要研究者的积极促成。

扎根理论所期望获得的理论包括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和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Glaser^{[53]144}提出实质理论是指针对具体经验领域发展出的理论。形式理论是呈现核心类属普遍意义的理论,是从广泛的实质领域的数据和研究中生成的^{[65]4}。实质理论能揭示特定情境或现象中的模式和内在机制,当从实质理论中获得足够的见解和数据支持后,研究者可能会向形式理论方向发展。实质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发展形式理论的关键步骤和基础^{[2]79}。从实质理论拓展到形式理论具有价值,因为形式理论增强了实质理论核心范畴的适切性和相关性,同时也可能为更广泛的应用提供支持^{[65]22}。在体育学领域运用扎根理论时,研究者

应当尝试探索如何追求形式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比较和整合不同实质领域的理论,扩展和重构理论框架,以获得更具普适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成果。通过从实质理论到形式理论的跃迁,体育学研究成果将突破特定情境的限制,提升理论的抽象层次和学术影响力。

扎根理论强调理论的发现,而非对既有理论的验证。这种探索性和生成性的方法有助于体育学研究者不断发现和解释体育现象,促进新兴理论的形成。扎根理论为我国体育学研究带来变革性的力量,但其科学性和规范性依赖于研究者的方法论素养和对理论生成过程的深刻理解。能否持续反思并将这一源自西方语境的方法论应用于我国的体育学研究,进而推动中国特色体育学研究的创新发展,是对我国体育学研究者的挑战。

注释:

① Glaser 在 1967 年提出的扎根理论经过多年发展,因学界出现不同的理论变体,促使他在 2003 年出版的《扎根理论视角 II》一书中开始使用“经典扎根理论”这一术语,旨在与那些经过实质性修改或误用的所谓“扎根理论”方法论划清理论边界。本研究中的扎根理论指的就是经典扎根理论。

② 前三册分别为 1967 年 Glaser 与 Strauss 合著的《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策略》、1978 年 Glaser 独著的《理论敏感性:扎根理论方法论新探》和 1987 年 Strauss 独著的《社会科学家的质性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 [1] GLASER B G, HON.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ts origins and growth[J].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16, 15(1): 4-9.
- [2] 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1967.
- [3] 林志义,杨海晨. 扎根理论在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运用情况与问题反思[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8(2): 182-190.
- [4] 吴肃然, 李名荟.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J]. 社会科学研究, 2020, 35(02): 75-98+243.
- [5] 沈小碚, 王天平, 张东. 对中国课程与教学论流派构建的审思[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6(1): 135-139.
- [6] 郭英德.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J]. 文学遗产, 2005(2): 69-77+159.
- [7] STRAUSS A,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8]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9] 林志义,杨海晨. 扎根理论迭代过程在体育学研究中的运用经验与问题——基于 SSCI 和 CSSCI 数据库的分析[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5): 72-82.
- [10] 石岩, 霍炫伊. 我国体育领域扎根理论研究质量系统评价及其控制[J]. 体育科学, 2021, 41(7): 67-78.
- [11] 林志义, 康益豪, 杨海晨. 扎根理论在体育学研究中的适配议题及理论基础[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4, 58(5): 10-18.
- [12] 董青, 毕剑秋, 洪艳. 高水平足球裁判员执裁效能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J]. 中国体育科技, 2021, 57(12): 44-52.
- [13] 王学彬, 郑家鲲. 中国体育智库竞争力影响因素与路径选择——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6(3): 70-77.
- [14] GLASER B G. Basics of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emergence vs forcing[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1992.
- [15] 肖婧莹, 周良君. 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协同发展: 困境与出路[J]. 中国体育科技, 2019, 55(12): 5-11.
- [16] 程文广, 张崇龙, 张生开. 我国学校体育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9, 38(4): 24-32.
- [17] 付群, 胡智婷. 扎根理论下我国省域体育企业疫后重振的现实困境与应对方略——基于湖北省 67 名体育官员调研报告的文本分析[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3(4): 55-66.
- [18] 王虹, 邹欢, 李锡瑶. 体育赛事主题曲影响力感知维度及其对赛事评价的影响[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6(12): 58-69.
- [19] 郭晴, 卢兴, 赵琬莹, 等. 观念的建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传播[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2): 27-35+78.
- [20] 袁梦莎, 陈青, 文娟. “懒”还是“难”? 公民健身行为的影响因素及作用路径研究——基于新浪微博网友评论分析[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9(3): 15-20.
- [21] 盘劲呈, 李海. 地方依恋与骑行旅游: “动态依附”体验的生成[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5): 63-69+76.
- [22] 王飞. 标志性体育赛事多元互动高质量发展的质

- 性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1(2): 102-109.
- [23] 杨闯建, 史维, 田小静.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实践研究——基于华东交通大学教改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J]. 体育学刊, 2023, 30(3): 113-119.
- [24] 李洁玲, 姚家新. 运动员心智游移:基于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16, 52(6): 43-50.
- [25] 刘瑞, 魏世杰. 新时代高等体育院校专业人才培养素养结构探索与培养路径探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3): 85-92.
- [26] 王斌, 郭冬冬, 刘炼, 等. 基于扎根理论的竞猜型彩民购彩感知价值概念模型研究[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15, 30(4): 292-297.
- [27] 黄越, 吴亚婷, 喻林. 基于扎根理论的青少年体育与健康素养评价体系构建研究[J]. 中国健康教育, 2023, 39(3): 211-217.
- [28] 赵芳, 刘楚琛. 性别观念的双向动态化:女大学生体育参与意愿变化逻辑的扎根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2): 52-58+66.
- [29] 兰顺领.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区域体育旅游协同发展的困境与出路[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6(5): 111-118.
- [30] 刘高福, 李永华, 聂晶. 价值共创视角下线上健身社区的治理模式研究[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5): 13-20.
- [31] 郑程浩, 吴燕丹, 陈潇航. 机能活动训练计划:在地化实践的效果与反思[J]. 中国体育科技, 2021, 57(5): 42-51.
- [32] 董晨, 张震, 杜熙茹, 等. 构建体育新发展格局视域下我国体育服务综合体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4(5): 507-515.
- [33] 朱德全, 曹渡帆. 教育研究中扎根理论的价值本真与方法祛魅[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1, 42(1): 67-76.
- [34] 葛小雨, 黄谦, 刘天戩, 等. 场所是否重要?体育锻炼场所依恋与主观幸福感的探索性研究——基于疫情期间居家锻炼者的访谈分析[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55(5): 35-42.
- [35] 胡咏梅, 闫昱新, 魏琳, 等. 角色转换视角下退役优秀运动员创业成功的心理影响因素模型构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3, 38(1): 99-104.
- [36] 韩青松, 冉令华, 向云平. 我国民俗体育的“民俗性”概念特征模型——基于徐闻藤牌功班舞的扎根理论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4, 44(2): 101-109.
- [37] 张龙. 对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质性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 2016, 52(5): 34-39+67.
- [38] 赵海波, 彭千. 基于扎根理论的体能教练实践能力探索性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2, 48(6): 74-79.
- [39] 张瑞林, 李凌, 王先亮. 冰雪体育用品共性技术应用过程绩效评价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18, 44(5): 7-13.
- [40] 杨鹏, 余典松, 石勇, 等. 马拉松赛事参赛旅游体验质量的感知评价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J/OL]. 旅游科学, 1-17[2024-11-15].
- [41] 张大为, 王晓晓, 康健, 等. 体育志愿服务参与行为何以持续:基于大学生身份转换视角的质性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2(6): 53-60.
- [42] 翁银, 李凌. 沉浸互动模型:滑雪消费心流体验机制的质性研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6(2): 78-84.
- [43] 周方祺, 许欣, 戴光全. 大众体育赛事参赛者的阈限体验研究——以马拉松参赛者为例[J]. 热带地理, 2023, 43(8): 1625-1636.
- [44] 郭庆. 老年人数字体育融入障碍的影响机理与应对策略——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3, 46(1): 93-104.
- [45] 贾旭东, 衡量. 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J]. 管理学报, 2016, 13(3): 336-346.
- [46] HOLTON J A. Grounded theory as a general research methodology[J].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08, 7(2): 67-93.
- [47] CORBIN J, STRAUSS A.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4th ed)[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15.
- [48] CORBIN J, STRAUSS A.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Procedures, canons, and evaluative criteria[J].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90, 13(1): 3-21.
- [49] CHARMAZ K. Grounded theory: Objectivist and constructivist methods[M]// DENZIN N K, LINCOLN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0: 510.
- [50] CHARMAZ K.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M]//HOLSTEIN J A, GUBRIUM J F.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ist research.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402.
- [51] GLASER B G. 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J].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 2002, 3(3).

[52] GLASER B G, HON. The grounded theory perspective II: Description's remodeling of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2003.

[53] GLASER B G. Theoretical sensitivity:Advances in the methodology of grounded theory[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1978.

[54] GLASER B G, HON. Doing quantitative grounded theory[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2008: 11.

[55] STRAUSS A L.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56] GLASER B G. Choosing grounded theory[J]. The Grounded Theory Review, 2014, 13(2): 3-19.

[57] GLASER B G. Doing grounded theory: Issues and discussions[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1998.

[58] GENTLES S J, VILCHES S L. Calling for a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sampling terminolog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oposed clarifications derived from critical analysis of a methods overview by McCrae and Purssel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017(16): 1-7.

[59] MOSER A, KORSTJENS I. Series: Practical guidance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t 3: Sampling,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J]. European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2018, 24(1): 9-18.

[60] CORBIN J, STRAUSS A.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3rd ed)[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8.

[61] CHARMAZ K.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2nd ed)[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4: 279.

[62] 费小冬.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论: 要素、研究程序和评判标准[J]. 公共行政评论, 2008(3): 23-43+197.

[63] STRAUS A, CORBIN J.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8: 124-125.

[64] CHARMAZ K. Grounded theory as an emergent method[M]//HESSE-BIBER S N, LEAVY P. Handbook of emergent method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8: 168.

[65] GLASER B G, HON. Doing formal grounded theory: A proposal[M]. Mill Valley: Sociology Press, 2007.

